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8

2013年1月23日

父亲的一桩未了文案

熊蕾

近日在网上看到〈熊向晖与原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琚的历史讨论文章（两篇）〉，想起父亲熊向晖与这位王琚及《炎黄春秋》杂志十多年前的一桩未了文案。现将父亲被扣未能发表的遗作与这两篇文章一起放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分辨。这里仅就所知，做一点说明。

《炎黄春秋》杂志 1999 年第 8 期发表了王琚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父亲以及当时活动自如、思维清晰的罗青长、陈忠经等经历过那些历史事件的长辈看了王琚的文章，认为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有打着纪念李克农的旗号抹黑周总理生前领导的情报保卫工作之嫌。于是父亲写出〈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交《炎黄春秋》于 2000 年第 3 期发表。父亲在文章中问王琚，断言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断言“‘文化大革命’后，

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紧接着,《炎黄春秋》在2000年第4期发表了王珺的〈复熊向晖质疑〉。父亲看了王的文章,不禁纳闷。王珺此文文末注明写于“1999年12月”。难道父亲的文章还没有发表,王珺就在三个月之前写好了答复?这可真是文坛奇闻了!对此,父亲直至2005年9月去世,都没有得到《炎黄春秋》和王珺的任何解释。

王珺这篇提前三个月写就的答复文章中,引用了若干《炎黄春秋》发表的父亲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話。比如,王珺说:“熊在‘质疑’中肯定地说:‘原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都不曾为王石坚及几个叛徒翻案,或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气十分武断……”遍查父亲的文章,都没有王珺所引的这句话。王珺更说父亲认为他的文章说“中央将王石坚定为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是‘诬’了领导,‘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说这话令人“毛骨悚然”。查父亲的文章,也根本没有所谓“严肃处理”的语句,不知王珺的“毛骨悚然”从何而来?

王珺以知情者当事人自居,引用了貌似权威却似是而非的材料,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父亲认为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根据权威部门编写或审定的公开材料,写出〈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揭穿王珺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一文。但是《炎黄春秋》以这样的争论“泄密”为由,拒绝发表父亲此文,尽管父亲这篇文章“只有一件是没有发表但不涉及机密的文件”,其余都是公开材料。这样,在当时,这件文案似乎以王珺最后发表的文章画上了句号。

12年过去,父亲已经不在,其余当事人或者也已故去,或者已无

法说话。而网上对这段文案的流传，却依然还在继续。既然如此，我就替父亲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让该见天日的东西不再埋没。

这里还想强调的是，王瑊在他那个部门，从一般干部到副部长，一直做人事工作，从未搞过情报业务。这从他的文章中，连国民党的军统和保密局的分野都分不清，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被拘的情报干部及受牵连人员的数字都交代得不明不白即可看出。但是业务不行的人整起人来，好像没有说的。1950年代，此案被捕人员有23人陆续回到中央社会部后，社会部对他们进行了审查。王瑊文中说李克农自任主任，却矢口不提他是具体承办人。1980年代初，中组部和原中央调查部对当年的审查结论进行复查，改变了19位同志的结论。

在这桩文案中，我父亲用大量的材料说明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但是王瑊却一再坚称“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而且说这无需有文件证明。给一个人做出能吓死人的结论却无需任何文件证明，恐怕就是王瑊主管干部的为政之道了。对子虚乌有的事言之凿凿，然后把“翻案”的帽子扣在所有指出那结论并不存在的人头上，这真是活生生的党同伐异了。这样的干部局长，真是让人开眼啊！

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

—— 揭穿王瑛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

熊向晖（2000年）

《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发表王瑛写的〈复熊向晖质疑〉，文末注有“1999年12月”字样。我写的〈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简称〈质疑〉）发表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这就是说，在〈质疑〉发表之前三个月，王瑛已写好了答复。这是怎么回事，姑不置论。必须指出的是，王瑛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谓的“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材料，甚至提到他所谓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致使不少读者认为王瑛言之有据，引起种种怀疑和猜测。由于王瑛所文不仅涉及李克农，而且涉及党中央，涉及我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作为知情者，我不能置之不理，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精神，特意写出本文。本文引用的只有一件是没有发表但不涉及机密的文件，其他全是权威部门编写或审定的公开出版物。借这些公开材料揭穿王瑛的胡言乱语，以正视听。本文的主要目的则是用这些公开材料向读者介绍李克农的我党情报工作的光辉历史，介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对我党情报工作的关心、爱护和杰出的领导。

杨尚昆论李克农

《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刊载“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瑛同志”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以下简称〈李克农〉）。编者在文前按语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

开创者之一”，“之一”二字加得很有分寸，显示这位编者的慧眼和匠心。凡是稍微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中共特别工作”，不论是指统战工作，外交工作，机要电讯工作，还是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都是开创者。作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和主要助手，李克农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光辉的建树是什么呢？

1989年9月15日是李克农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杨尚昆写的〈丹心留人间，勋业传后世——纪念李克农同志诞辰90周年〉（以下简称杨尚昆文）。文中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李克农“总是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精神，创造性地完成任任务”。“尤其是在情报和保卫工作上，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才能，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中央提出了决策情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勋绩”。杨尚昆文着重指出：

解放战争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克农同志具体负责实施，使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主席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是最成功的”。

王珺笔下的李克农

在〈李克农〉一文中，王珺写了四个题目，即：“敢于得罪康生”，“龙潭建奇勋”，“单刀赴会劝少帅”，及“坚持原则，浩然正气”。

“敢于得罪康生”，内容是1943年的“抢救运动”。王珺写道：“李克农为形势所迫，不能不开展‘抢救运动’，但他对康生的做法是

有保留的。”文中并未举出李克农“敢于得罪康生”的具体事实。我不理解，在介绍李克农的文章中，王珺因何要写“抢救运动”？

“龙潭建奇勋”。这个题目歪曲了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的事迹。王珺虽然也写道：“1928年到192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先后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打入国民党CC徐恩曾特务系统。”但这短短50多字，就有三处错误。第一，陈立夫建立由徐恩曾主持的特务系统，是在1929年12月。李克农怎么会在这特务系统尚未建立的1928年就“打入”呢？第二，192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政治委员周恩来兼任中央军事部长，哪有王珺胡编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三，派遣李克农等三人打入徐恩曾特务系统的，也并不是周恩来。

关于“龙潭三杰”，杨尚昆文写道：“1929年，党（熊按：未说周恩来）派克农同志同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打进徐恩曾把持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顾都知道，……克农同志得到钱壮飞派人由南京连夜送来的这一紧急情报，他沉着机警，千方百计地设法找到陈赓同志报告了党中央。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立即同陈云同志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使党中央机关得以安全转移，彻底粉碎了敌人破坏我党中央的罪恶阴谋。同时，克农同志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不顾敌人的追捕，也不及考虑自己妻儿的安全，亲自安排了战友钱壮飞及其家属和胡底同志的安全转移。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得到党中央的嘉奖。毛主席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以此与王珺所写的〈李克农〉相对照，就会看出问题：

(1) 杨尚昆文记述了“毛主席曾说”的一段话，写得十分清楚。而王瑁却抹去了“钱壮飞等同志”，编造出1967年1月的一条“最高指示”，说毛主席对康生讲：“康生啊，你不是告几个人要害你吗？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已经有了定论，可是李克农不同，……”王瑁居然在1999年8月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硬说：“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已经有了定论”，这是为什么？

(2) 杨尚昆文中讲到，李克农“亲自安排了战友钱壮飞及其家属和胡底同志的安全转移”，展现了李克农的高尚品质，而王瑁却避而不谈。

(3) 王瑁文中只字未提聂荣臻。1983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说：“1930年5月，我来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周恩来同志是决策人。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顾顺章这个人过去耍魔术，在上海开过一家魔术店，是个流氓无产者。”（第118页）而王瑁在《李克农》一文中却说：“顾顺章，工人出身，能双手打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武装起义担任纠察队长，表现勇敢。”《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还写道：“当时在特科搞具体领导工作的，除了我以外，还有陈赓，李强等同志。特科的工作是紧张活跃的。我们（熊按：未说周恩来）派了像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这样一些好同志打进敌人的要害部门。”（第119页）聂荣臻特别提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况，他写道：“我得到情报之后，急忙赶到周恩来家里”，并评述了“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应变措施（第126~128页）。王瑁文中为何有这些疏漏呢？

“单刀赴会劝少帅”。1936年12月，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与戴绶元等到洛川与张学良谈判，既不是“单刀赴会”，也不是“劝少帅”。

“坚持原则，浩然正气”。王瑁着重写了“1947年10月”，“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事件。王瑁对1947年及解放战争期间李克

农主持的情报工作的丰功伟绩闭口不谈，却专门挑出“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有过的重大事件”来渲染。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王珺继续就这一事件胡言乱语。以下就有关问题分别作出澄清。

1947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客观原因

1946年6月蒋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中共代表叶剑英、秘书长李克农等由北平返回延安。3月13日，蒋军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李克农主持的情报部门事先报送胡宗南的进攻计划，中央得以从容处置。3月19日，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指定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后委）。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作了分工，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少数人员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中央前委）。李克农派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中央前委行动。

中央文献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陈云题写书名，杨尚昆作序）第一部第532页写道：

一般人都说，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我说，应该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为确切。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人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司令部的主帅，当然是毛泽东，副帅就是周恩来。他直接领导五六个精悍的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地收集敌情（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我情（解放区军民、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和人民）以及友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势力、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以至国际友好人士），加以分析研究，及时报告毛泽东，参与决策，并向各中央局、野战军司令部通报，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专家。专管敌军的，凡国民党的军队每天驻扎在那里，向那里调动，长官的出身、经历、指挥能力，部队的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如何等等，都了如指掌，……

在陕北窑洞里的中央前委参照李克农主持的情报系统提供的情报，在1947年10月前曾取得以下战果：

(1) 在撤离延安45天内，陕北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二万余，后又在沙家店全歼胡宗南整编第36师。到8月间，蒋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

(2) 从1947年3月至6月，我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收复和解放153座城市，歼敌40余万。

(3)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连续作战28天，歼敌5万6千人，于8月进入大别山区。

李克农主持的中央社会部及所属各情报系统（包括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王石坚等情报系统），不但要搜集“敌情”，而且更要搜集“友情”，乃至搜集国统区的重要舆论和社会动态。大量的情报都通过设在国统区的秘密电台发出。那时我们的密台设备落后，发出的电报错字较多，上级常要查询。密台为准备上级查询，常需要把发过的电报底稿保留若干时间。以王石坚系统的北平密台为例，每天通报时间常达六、七个小时。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是不许可的。但在当时，为了使住在陕

北窑洞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尽快了解到更多的准确情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密台发报时间过长，自然就增加了暴露的机会。

还应提到：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划为第 11 战区。司令长官是原西北军的孙连仲。党外进步人士余心清任 11 战区少将设计委员。1947 年 9 月，他通过关系人找到王石坚系统驻北平的情报人员董明秋，要求速电周恩来、叶剑英，说孙连仲准备起义，请速派人来谈。董通过北平密台电告中央前委。对此，周恩来认为，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不多，11 战区的主力部队隶属胡宗南的第 34 集团军，下辖第三军和第 16 军，如孙连仲突然起义，势必被第 34 集团军歼灭，应予劝阻。经中央前委同意后，复电北平王石坚系统。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过于自信，竟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组成第三实力（熊按：原文如此），斡旋国共两党关系”。美联社立即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 1936 年西安事变之势。蒋介石正在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马上飞回南京，责令保密局（原军统局）局长郑介民对北平方面加紧侦察。在郑介民的严格命令下，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利用美国新制的空中测向仪，确定我北平密台的具体方位，马汉三又利用“飞贼”段云鹏连夜挨户侦察，查到我北平密台的确切地点。1947 年 9 月 24 日夜，正直我北平密台报务员准备架机工作时，蒋特突然闯入室内，将北平密台负责人李政宣及工作人员李毓芹等四人当场逮捕，电台、密码、情报底稿、活动经费等全被搜缴。李政宣被捕后，供出领导人王石坚等。王石坚于 9 月 29 日深夜在西安被捕。

上述情况都是国民党当局早已知道的事。王琚在〈李克农〉一文中说，王石坚系统被敌人破获是在 1947 年 10 月。连时间也未弄清，居然

大做文章。

周恩来、李克农对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态度

1947年9月24日，北平蒋特拘捕了与王石坚系统有牵连的地下党负责人、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婿袁永熙，9月26日拘捕了董明秋，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二人。

9月24日蒋特拘捕了北平密台李政宣等四人后，他们供出了沈阳密台负责人及另外五个情报人员。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北平蒋特于9月25日拘捕了情工人员董剑平，董供出了在国民党第11战区任职的五位重要情报人员，他们是：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朱建国（中共党员），北平第一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这五位同志曾提供过重要情报，被捕后，蒋特施用各种酷刑，他们英勇不屈，1948年10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谢士炎事先写好遗书，在刑场上怒斥国民党，带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当刽子手大喊“跪下”时，他们朗声回答：“我们不跪！”五人都是挺身站著就义的。这五位烈士永垂不朽。

王珺文中说“王石坚情报系统”是“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又借别人之口，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含沙射影，矛头实指李克农。李克农是光明磊落的。开诚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以下简称开诚写的书）第492页写道：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李克农深感内疚，他沉痛地检查”。“李克农并不强调客观因素，着重从他的指导思想检查领导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他“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表态说，“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

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

李克农、周恩来的态度都具有典范意义。

开诚写的书由国家安全部办公厅作序，序中说：“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向开诚同志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核定稿。”

李克农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情报战果更加辉煌

王琚在〈复熊向晖质疑〉中说：“熊向晖硬说在我笔下的李克农”“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又说：“不能离开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离题万里”。

读者不难查对，在〈质疑〉一文中，并无李克农“在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句话，这是王琚无中生有的编造。在〈质疑〉中，我写的是：“王琚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还引用了开诚写的书中的话：“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吸取教训。”（第441页）王琚文章的题目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当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时，介绍李克农及时采取措施，怎么是“离题万里”呢？“离开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的，恰恰是王琚自己写的文章，而其内容又大多是胡言乱语。

开诚写的书中还说：“李克农加紧实施善后措施，指示各地要接受‘王石坚事件’的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共产）党的关系，密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人员的安全。”（第443页）正是由于李克农采取了王琚没有写的这些有力措施，我党情报工作未再发生大的事故；而情报战果更加辉煌。就在1947年9月王石坚系统被破坏后，到1947年底，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有：

(1) 晋察冀野战军 1947 年从 10 月 18 日至 22 日，全歼了蒋军第三军 1 万 8 千余，包括军长罗历戎在内，无一漏网。

(2) 晋察冀野战军于 1947 年 11 月 12 日解放石家庄，全歼守敌 2 万 4 千人。

(3) 刘邓大军从 1947 年 9 月到 11 月，歼敌三万余人，初步打开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这些胜利的取得，与李克农主持下的情报工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提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选》第四卷第 1243 页至第 1263 页），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1947 年 7 月至 9 月间，人民解放军即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转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二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尽管王石坚系统被敌人破坏，但李克农主持下的情报工作对于这一“历史的转折点”和“伟大的事变”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永垂史册的。

1948 年，我军由“战略进攻”转到“战略决战”。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以及 1949 年的渡江南进的战役中，李克农主持下的情报工作战果更加辉煌。在开诚写的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不赘之。

李克农、党中央并未定“王石坚是叛徒”

王珺在〈李克农〉一文中写道：“王石坚被捕后叛变投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见《炎黄春秋》1999 年第 8 期第 16 页）我在〈质疑〉一文中写道：“原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

“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王瑛在〈复熊向晖质疑〉中改口说：“认为中央为王石坚定性一定得有‘书面报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在此，王瑛明明白白地承认，他所谓“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一事，李克农并无“书面报告”，中央并无“批件”。

王瑛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又有新的说法，现予引用，并予澄清：

（一）王瑛写道：“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与会同志均表同意”。“文革”期间有“中央专案组”，而在1956年，中央怎么会撇开李克农，定原由李克农领导的王石坚为叛徒，然后再由李克农“传达”呢？1956年“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难道只是口头说说，而无书面文件吗？李克农只是口头传达，而无书面记录吗？借用王瑛自己的话：“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老同志怎么能不懂呢？”

（二）王瑛写道：

康生1967年4月28日与周总理、李富春一起在国际关系学院接见中央调查部和学院的群众代表时，谈到熊向晖任胡宗南秘书一事，说：“那时候有一个人（指王石坚）被捕了，叛变了，隐约地讲了他（指熊）是共产党。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共产党，胡宗南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记录稿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康生很清楚地讲王石坚被捕叛变了。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周总理在场，而且也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

一事是绝对真实的。

王珺写的像煞有介事，真相究竟如何呢？

(1) 所谓“康生 1967 年 4 月 28 日与周总理、李富春”的那次谈话“记录稿”无需上“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查找，我手头就有一份抄件，封面印的是《中央首长对我部的重要指示（1966.12~1968.1）——井冈山革命造反总部、革命串连会总部编印》。内中有一节是〈总理、康老、富春同志接见联络站和学院代表时的讲话摘要（1967 年 4 月 28 日）〉。与王珺所引的那一段对照，除没有（指王石坚）（指熊）外，完全相同。在这份记录上，康生讲话之后，周恩来并未发言。

(2) 据这一记录，康生说：“那时候有一个人被捕了，叛变了”。王珺一加引申，就变成“康生很清楚地将王石坚被捕叛变了”。王珺说，“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这就是说，1947 年王石坚被捕之后，讲出熊向晖是共产党，胡宗南为了对付反对派的攻击，“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事实如何呢？请看《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671 页：

（1946 年）6 月 10 日 和董必武接见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熊当时被胡宗南保送，将赴美国深造，他表示全面内战即将开始，留在国内做情报工作对党有利。周恩来说：出国留学为好。如果战争时间长，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内地位提高，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回国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官。翌年，熊向晖赴美前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的作战情报。

(3) 康生对以上情况并不了解，怎么能说“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呢？康生讲话后，周恩来并未发言，怎么能说完全了解上述情况的周恩来“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呢？怎么能说“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 1956 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

是绝对真实的”呢？

(三) 王琚对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情况写了不少，现边引边评：

(1) 王琚写道：王石坚“后随国民党撤到台湾，担任了敌人特务机关‘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一说组长）”。——王琚连王石坚在台湾“匪情研究所”任何职务都搞不清楚，是“所长”还是“组长”都不能肯定。遑言其他？

(2) 王琚写道：“王石坚被捕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机密，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罪行累累，远远超过‘假自首’的范围，中央认定他是个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是一点也不错的”。——我对王琚所谓的“假自首”问题不发表意见，也暂时不谈王琚所写的王石坚的“罪行累累”，只提一点情况和看法：王石坚于1949年9月29日被蒋特拘捕。据台湾报刊所登“讣告”，他于1985年6月8日在台湾死去。从王石坚被捕到死去，共35年8个月10天，王琚怎么能作出王石坚“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的结论呢？王琚怎么能把这一不符事实的结论，作为“中央认定他是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的根据之一呢？

(3) 王琚写道：“周总理曾考虑用国民党特务沈醉把他换回来，但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未换成。原因是在联系中，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已经彻底叛变，忠心事敌，将我方最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敌人。中央已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虑了。”——我应指出，王琚从一般干部到副部长，一直做人事工作，从未搞过情报业务。但是，从未搞过情报业务的读者们也可以判断，“对方”能够把王琚所写的那样的“信息”想成“反馈”么？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所有情况，台湾当局完全了解，台湾还有不少知情人健在，他们都知道，并无王琚所

谓的“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无王琚所谓的“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琚所写的有关王石坚在台湾的“罪行累累”的判断，有些不符事实。作为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琚在这样的问题上信口开河，可能在台湾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为此，我有必要加以澄清。

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至于为何不给他定性，我不作解释。但我负责地指出：王琚在文中九次提到“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纯属子虚。既然李克农和党中央从未为王石坚定案，当然谈不到有人为他翻案。

王琚还搬出我在〈质疑〉一文并未提到的“1998年11月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一事，并写道：熊批评某位领导说，“我认为XX同志对有的问题过了点”。我未说XX，而说青长。在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时，我对罗青长及某些同志提出批评，有些同志对我提出批评，这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王琚却把讨论中的发言任意曲解，公之于众。这是很不正常的，对此，我不予置理。但应指出，罗青长并未像王琚在〈李克农〉一文写的那样“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的几个叛徒翻案”。我在〈质疑〉一文中为此辩诬。这正是王琚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所说的“坚持原则性，坚持党性”。

周恩来正确判断敌情 李克农关心情报干部

王琚在〈复熊向晖质疑〉中说，熊向晖所说1949年5月罗青长所谓“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熊按：三人指申健、陈忠经、熊向晖）“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接着王琚写了很长一段，摘引如下：“王石坚刚被捕时写的自白书中五处提到熊向晖，17处提到陈忠经”，“在军统特务行动处长叶翔之的连夜突击审讯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前引康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很清

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查原国民党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208页……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王琚这段文字给人的印象是：申健、陈忠经、熊向晖有问题。我手头有一本沈醉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印数70万册），第208页是该书〈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一章中的一页，并无关于叶翔之的内容。倒是在该书另一章〈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的第223~224页，沈醉写道：“1947年秋冬，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里，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以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军统内幕》是公开出售的畅销书，读者不妨查对。其中连熊向晖、王石坚的名字都未提，哪里有王琚所写的“详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怎么会像王琚写的那样“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

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在王琚的笔下，叶翔之是“军统特务行动处处长”，而沈醉所写的叶翔之是“保密局行动处处长”。王琚只知道“军统”，而不知道1946年蒋介石撤消了“军事委员会”，“军统”改称“保密局”。

为何毛人凤指示叶翔之，“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呢？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一章里写道：“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戴笠对军统内部的重大问题，也要找胡商量，并请他帮忙的”。“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笠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戴笠死去以后，毛人凤继承了戴的衣钵，对胡不但和过去一样，并更加依靠他。当时军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胡却极力支持，一再在蒋介石面前讲好话。当时许多特务对他这样的表现都表示感激，认为他始终是爱护军统的。毛人凤对胡非常尊敬”。

罗青长说过，1947年在陕北中央前委获悉王石坚被捕后，开会研究已在美国的申健、陈忠经和熊向晖三人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判断，国民党当局不会向美国提出引渡这三人的要求，因此这三个人的安全没有问题。周恩来因何作出这样的判断呢？我在〈质疑〉一文中提到我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约稿并审定）的记载。为免读者查找，再予引用：

1949年7月，罗青长领著从美国回到北平的我去见周恩来，当谈到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及王石坚被捕时，周恩来说：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

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时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著顶著，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1947年王石坚被捕后，中央前委在陕北研究时，周恩来判断国民党当局不会向美国提出引渡我们三人，认为我们三人的安全没有问题，他所依据的就是对胡宗南和保密局头子们之间的关系的透彻了解。沈醉在《军统内幕》中所述情况，证实了周恩来判断的准确。王瑀既然公开推荐沈醉的这本著作，怎么体会不出来呢？

开诚写的书中第45章题为〈保护干部〉，第443页写道：“由于王石坚系统被敌人破坏，打入西安胡宗南部的陈忠经、熊向晖和申健身份已经暴露。”“李克农很焦急，立即展转通知在美国留学的陈忠经三人，目前千万不要回国，以免遭受暗害。”这件事写得不准确。我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书中写的是：我们“经过曲折的途径，得到以中共中央名义转来的口头指示，让陈忠经、申健和我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但开诚写的“李克农对情报干部特别爱护，许多人都有亲身感受”（第437页），则是千真万确的。

对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捕人员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

（一）王瑀在〈李克农〉一文中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实际情况是，被捕、被

拘共 123 人，其中包括我情工人员及与王石坚系统有牵连的人员 44 人。

在被捕的情工人员和与王石坚系统有牵连的 44 人中，有 21 人的情况是（1）党外进步人士及地下党负责人共二人，即余心清（早已获释，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袁永熙（于 1948 年经多方营救获释，1949 年任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1952 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2）壮烈牺牲的五人（即谢士炎等五烈士）。（3）涉嫌无辜被捕的二人。（4）解放后由其他有关单位审查处理的五人。（5）北平密台负责人李政宣等四人被捕后越狱逃出，解放后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刑（二人被判刑 15 年，一人被判刑十年，一人被判刑半年）。（6）被国民党当局送往台湾者二人（即王石坚和 XXX）。（7）下落不明者一人。

（二）王瑊在〈李克农〉一文中说：“全国解放后，此案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由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对该案中有叛变行为的人员，曾专门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说：……应按照中央现行的处理自首叛变的文件执行。因此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

实际情况是：1949 年四、五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捕人员 23 人（不含上面所介绍的 21 人）陆续回到中央社会部。6 月，社会部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委员会由李克农主持，罗青长参与，王瑊是具体承办人。（对此，王瑊没有提及。）

1949 年 9 月，中央社会部根据中央当时的政策（包括中央关于审查情报人员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央组织部对审查王石坚案人员的指示），并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情况，对这 23 人作出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并经中央组织部审批签署。这 23 人中，定为叛变和自首叛变行为的 18 人，

严重政治错误和政治错误的四人，政治坚定一人。这 23 人中，有中共党员 18 人，给予党纪处分的 16 人，包括开除党籍 12 人，留党察看一人，按消极脱党处理一人，按重新入党处理的二人。

王珺作为具体承办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竟没有写出事实真相。

(三) 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文中说：“1983 年 9 月 22 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原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强调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因胡耀邦有事，由赵紫阳主持。王鹤寿讲……赵紫阳也说……王鹤寿还说……赵紫阳及做记录的张韬仍然健在，可以作证。”

1982 年 4 月，我被免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同年 10 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我接替刘宁一，担任以荣毅仁为董事长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并兼副董事长。对此后调查部的情况不了解。2000 年 4 月 26 日，我找到多年没有见面的张韬和安全部承办落实政策工作的宋志芳。事先我未告诉他们要谈什么，但他们都已看过《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珺两篇文章和我写的〈质疑〉，主动准备了有关文件。

据张韬所谈（他事后又写了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

(1) 1983 年 9 月 22 日上午中央书记处的议题是：中央调查部和中央组织部上报中央书记处的《对王石坚情报系统人员被捕问题复查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个《请示报告》涉及的是 1949 年作出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的 23 人，其中没有王石坚。

(2)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萍和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参加会议。罗青长经中央同意，让具体参与复查工作的张韬列席。

(3) 张韬说，作为列席人员，他无权为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做记录，他只做了一个“纪要”存档。王珺文中写了这次会议中赵紫阳、王鹤寿的发言，是否得到中央授权？是否经过请示批准？是否与原记录相符？

我不知道，也不置评。

1983年中央决定撤消中央调查部，另建国家安全部，任凌云为安全部部长，原调查部副部长王瑁被任为安全部副部长之一。罗青长离职休养。

(四)宋志芳向我提供了1984年4月7日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的国家安全部党组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呈中央书记处的《对王石坚情报系统人员被捕问题复查工作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复查报告》)。中央批示“同意”的这一《复查报告》没有公开发表，现将其中不涉及机密且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摘录如下：

(1)《复查报告》说：1949年此案处理后，有些人就提出申诉，认为处理过重，以后又陆续要求复议。从1980年开始，对该案进行复查。(熊按：1980年我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我知道具体办理复查工作的是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和中央调查部以王瑁为局长的干部局。)

(2)《复查报告》说，我们(熊按：指中组部和中调部)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特别是根据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方针政策，重新作出了复查。复查中既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此案的特殊性，也考虑到各人被捕前后的表现。这批同志大多数在被捕前后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真正叛变的只是个别人。如西安、沈阳的一些同志，在组织开始破坏、自己面临被捕的紧要关头，仍能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地向中央报警，隐藏或销毁电台、文件、密码、资财，保护同志和党的机密。有的同志虽有逃走机会，却不顾个人安危，监守岗位，营救同志。被捕后，他们能和敌人进行斗争，看到五烈士英勇就义后，有的同志写了遗书，准备牺牲。有些同志被捕后，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多是在领导人王石坚、李政宣等人先已供出，敌人掌握了证据，难以否认的情况下承认了一些情况。

(3)《复查报告》说，我们两部反复研究，分别经两部领导讨论

审定，改变 19 位同志的结论，维持原结论的四人。

维持原结论的四人中，叛变、开除党籍三人，叛变性质的政治错误，重新入党一人。（熊按：在上述叛变、开除党籍三人中，有一人即是 1947 年 9 月 25 日被捕，供出谢士炎等五同志的董剑平，1949 年 9 月，被送公安部关押。）

改变原结论的 19 位同志中，没有一人被定为叛变或叛变性质的错误。

(4) 《复查报告》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首先从北平开始。1947 年 9 月 24 日夜，蒋特将北平密台负责人李政宣等四人逮捕。李政宣被捕后供出王石坚等，致使王石坚于 9 月 29 日深夜在西安被捕。

(5) 在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国家安全部党组和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报告》中，对王石坚本人只有以下一段（这一段的情节都是国民党当局已经知道的）。现全文抄录如下：

他（熊按：指王石坚）早期的自白书中，除保留了打入敌人核心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秘密党员和别人不知的天津密台外，将其余下属大多数人员向敌供出，以致案情迅速扩大，波及我西安、沈阳、兰州、承德五个城市情报组织，从领导到基层，从人员到电台几乎全部破坏。9 月 24 日至 10 月 29 日，先后被捕、被拘共 123 人，其中我情工人员 44 人，子女 13 人，涉嫌 66 人。44 人中，五人牺牲，三人随国民党逃台（后回来一人），其余多在全国解放前夕敌人按紧急疏散条例释放了，也有的是我军进城后从监狱解放出来的。王石坚后去台湾任少将“匪情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情况不明。

这一段同《炎黄春秋》2000 年第 4 期刊载的王珺所写〈复熊向晖质疑〉相对照，相信读者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6) 前已提及,《复查报告》是国家安全部党组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中央书记处的,现只补充一点,当时王瑛是国家安全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结束语

关于“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事件,该写的、能写的,本文都写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到此结束。倘王瑛还要就此事发表文章,我不再作出答复。

王瑛在〈复质疑〉中说,熊向晖在〈质疑〉中提到,“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读者可以查证,〈质疑〉一文中并无这句话,这又是王瑛无中生有。但我公开宣布,我决定将刊出后的本文及〈质疑〉一文分别报送国家安全部领导和中央组织部领导,如认为我写的这两篇文章有不符事实之处,我甘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附录一

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

熊向晖¹

《炎黄春秋》1999年8月号（总第89期）发表了王琚撰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编者在文前加上按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本刊为纪念这位深潜魔窟建奇功的一代英豪，特别发表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琚同志写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由于《炎黄春秋》刊载的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因此，王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

笔者曾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对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两项质疑。

质疑之一

王的文章说：“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过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

这确实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是如何对待的呢？王是这样写的：

那时中央社会部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突然见

¹ 《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李克农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都哑了，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竟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一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王石坚及许多干部被捕，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他像大病一场。

在王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始而“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继而“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像大病一场”。根据这些生理现象，王在文章中竟说：“这件事情使我体会到李克农对情报组织和情报干部关心之深，爱护之切。”这样的推断岂不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为了和王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相对照，现全文抄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第751~752页——1947年10月3日和6日的记载：

10月3日 从合众社一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月6日 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正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看到合众社

的一则电讯以后，就连续发出一系列周到缜密的指示。作为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并实际上主持部务的李克农，怎么会像王写的那样只是“痛苦和焦虑”而无所作为呢？怎么会连周恩来 10 月 6 日“望告”的电报也不答复呢，这使读者对李克农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克农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关机密，可能王不得而知。但事隔五十多年，王已当过副部长，撰写文章介绍李克农，文中又特别强调“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重大事件”，对自己仍不了解的事，总该查查档案，问问知情的人吧。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即主管秘密情报（包括“王石坚系统”）指导工作的罗青长，至今健在，记忆清楚，又是王的老上级，为什么不向他请教呢？

1996 年 12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开诚著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该书第 45 章中写了 1947 年 9、10 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时，李克农率领中情部机关人员住在晋西北临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知道这一严重事件后，十分痛苦和焦虑，一连十几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像大病一场。（第 441 页）

王的记述在内容和措词上与上文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增加了“突然见”、“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以及“后来我才知道”等表示亲见亲闻的字句。但是，开诚在这一段之后，在同一页上，还写了以下的话：

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吸取教训。

只有简短的几句话，提供的资料并不多，远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从中也可略见李克农在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王却连这几句简短的话也不提。介绍李克农光辉业绩的文章，因何出现这

样大的漏洞呢？这是笔者提出的质疑之一。

质疑之二

199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本报讯”，正题是〈《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15周年》〉，副题是“本报五版刊登熊向晖同志文章〈周总理的魅力〉”。 “本报讯”中称：“本报五版特刊载熊向晖同志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摘录：〈周总理的魅力〉。原文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本报《海外版》自1月7日起全文连载”。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以下简称〈地下〉）记述了1937年冬，笔者遵照周恩来的布置，到国民党胡宗南部工作，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同笔者联系的中央社会部驻西安人员几经变动，1941年后长期由王石坚联系。1947年胡宗南资送十几名部属赴美国留学，其中包括笔者及王石坚联系的另两名我党地下工作者陈忠经和申健。1949年5月笔者回到北京，先见罗青长。〈地下〉一文中有一段记述：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不久，周恩来接见罗青长和笔者，谈到王石坚被捕事。〈地下〉一文的有关记述是：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

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当时周恩来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王珺的文章说：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按照“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定为叛徒的四个人中并无王石坚）。

〈地下〉一文发表后，几位不相识的读者写信给笔者，希望了解王石坚尔后的情况。对此，笔者并无所知。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2月号和3月号全文转载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该刊编者在〈熊向晖一文有关人物简介（二）〉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199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将笔者的几篇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师》，在该书〈地下〉一文里，笔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注释，第41条注释是：“据台湾报刊1991年材料，王石坚‘随同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笔者认为，“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已可说明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政治面目。《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珺的文章写道：王石坚“被捕叛变投敌，去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死心塌地，忠心事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笔者阅后甚为惊讶。李克农于1962年逝世，他生前已“报告中央”把王石坚“定为叛徒”，而笔者在1995年出书时对王石坚的注释中却未提这一点，尽管笔者事先毫不知情，但难免被认为是原则性政治性的错误。为此笔者特意询问了原中央调查部部

长、长期是李克农主要助手的罗青长，他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

更使笔者惊讶的是，王的文章还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王未说“个别领导”是谁，但笔者于1973年10月至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也有王所说的“个别领导”之嫌。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以下两点，从未听王讲过：

第一点：所谓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

第二点：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两点都是政治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鉴于王已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炮制的这两点公之于世，笔者有权利、有责任公开向王提出质疑：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情报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大机密性，一般人视之为神秘。“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题目又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发表在著名的《炎黄春秋》上，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笔者对王的这篇文章提出两项质疑，一项是为了维护李克农的声誉，二项是为王文中所谓的“个别领导”辩诬。同时借此向可能被王误导的读者作些澄清。这是符合《炎黄春秋》“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今古大事”的办刊宗旨的。

附录二

复熊向晖质疑

王珺²

拙作〈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发表后，看到熊向晖对此文的“质疑”，答复如下：

一、如此“无所作为”

拙文列举了在王石坚案发生后，李克农陆续采取了如下善后措施：1、要有关同志查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2、寻找脱险同志的下落；3、安排返回解放区的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4、对该案中回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组织学习和进行审查；5、对遇难的烈士进行追悼；6、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这些虽然还不是他所采取措施的全部，但也是很重要的。熊向晖对此段内容竟视而不见，硬说在我笔下的李克农“无所作为”，“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不顾事实，妄加指责，令人难解。

正当解放战争高潮急需情报的时候，重要情报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李克农的焦虑和痛苦确是笔者亲眼所见，是情之必至，理所当然。他关怀、爱护干部也是有口皆碑的。熊向晖斥为“牵强附会”，竟滥予嘲笑，蓄意丑化。李克农精明强干、坚决果断，在业务上会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拙文这段标题写的明明白白，中心是要表现李克农在本案人员的审查和处理上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和高度的原则性。不能在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离题万里。李克农

² 《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

高风亮节、功勋卓著，在国家安全战线和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纪念他百年诞辰是很庄重的事情，而熊向晖竟以轻薄之词给予冷嘲热讽，是不严肃的，是对先贤的失敬，对读者的轻慢。

至于“质疑”中提到我的这段文字与开诚所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有关的内容与措辞完全相同一节，在此简单说明一下。我于1989年3月写过一篇关于李克农的回忆录〈最可宝贵的因素〉，载入《纪念李克农文集》，其中163页谈及此事，拙作再次引用了自己这段叙述。此书于1989年8月出版，早于开诚之书八年零两个月。至于文字相同，是偶合还是开诚参考了本人原作，不得而知，即使有所参考也是正常的，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二、“无批件论”可以休矣

为王石坚翻案的一些理由中，“无批件论”是熊向晖在“质疑”中的新发明，目的无非是以怀疑李克农对此事的传达来否定王石坚是叛徒的定论，这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请看一系列的事实。

1. 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非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严刑拷打，被判徒刑。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纯惨遭杀害。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认为是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大事犒赏有功人员。王石坚也因有功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后随国民党撤到台

湾，担任了敌人特务机关“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一说组长）和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

由此可见，王石坚被捕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机密，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他长期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罪行累累，远远超过“假自首”的范围，中央认定他是个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是一点也不错的。

2. 康生 1967 年 4 月 28 日与周总理、李富春一起在国际关系学院接见中央调查部和学院的群众代表时，谈到熊向晖任胡宗南的秘书一事，说：“那时候有一个人（指王石坚）被捕了，叛变了，隐约地讲了他（指熊）是共产党。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共产党，胡宗南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记录稿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康生很清楚地讲王石坚被捕叛变了。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周总理在场，而且也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 1956 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绝对真实的。

3. 周总理曾考虑用国民党特务沈醉把他换回来，但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未换成。原因是在联系中，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已经彻底叛变，忠心事敌，将我方最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敌人。中央已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虑了。与会同志均表同意。此事的内在联系、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可以看出李克农的传达和中央对王的定性都是势所必行、行所必至，是此事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根据大量事实，中央确认王石坚彻底叛变，忠心事敌不过是一言可定、顺理成章之事，铁案如山。认为中央为王石坚定性一定得有“书面报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顾顺章、叶青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叛徒，都是他们背叛革命的丑恶实践所决定的，而不是靠什么人的“书面报告”和中央“批件”所决定的。李克农当时常传达中央领导的

一些重要指示和决定事项，如果都要求必须有“批件”才相信和服从，有些工作将陷于瘫痪和寸步难行。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老同志怎么能不懂呢？所谓“无批件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熊向晖讲，中央对王石坚的认定竟与自己〈地下〉一文中对王的注释有所不同。这又何必惊讶，把注释改过来就是了。

三、口吐不实之辞

1. 熊在“质疑”中说：1998年11月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时，王瑛发言中并未谈及李克农传达王石坚叛变投敌、中央认定他是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的事。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我在11月23日下午发言，专门谈了这两个问题，与会的十五、六位同志都听到了。录音带保存完好。

2. 质疑中引用熊〈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说，“1949年5月笔者回京，先见罗青长，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大批敌伪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1949年本人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据我确知，该年5月我部并未查获与王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与此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是1950年下半年之后才从南京查到的（这些档案现存国家全部档案馆）。因工作关系，几百份案卷我全部查阅过，其中根本没有敌人对王石坚的全部审讯记录。所以1949年5月罗青长接见熊向晖时绝对不可能讲上述的话。所谓“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王石坚刚被捕时写的自白书中五处提到熊向晖，17处提到陈忠经，详述了与他们的来往及掩护关系的情况。虽还未提及情报关系，但在军统特务行动处长叶翔之的连夜突击审讯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前引康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查原国民党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208页、《我的特务生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

李海生、完颜绍元著《军统巨枭毛人凤》（上海人民出版社），四书有关章节中使用了一些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都详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因篇幅关系不能详引，但几本书所述相同，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3. 熊在“质疑”中肯定地说：“原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都不曾为王石坚及几个叛徒翻案，或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气十分武断，可惜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强调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因胡耀邦有事，会由赵紫阳主持。王鹤寿讲：“王石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赵紫阳也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王鹤寿还说：“不要一风吹。”我认为这些话是对王石坚翻案的意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明确王石坚的叛徒问题不能翻案，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央对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已经定了案的，否则“王石坚不能翻案”又从何谈起呢？与会的王鹤寿、陈野萍现已辞世，赵紫阳及做记录的张韬仍然健在，可以做证。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黄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讲话中说：“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王1940年6月到西安负责领导情报工作……，1947年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伯克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上见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1994年第1期）

以上两项极重要档案材料白纸黑字，赫然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清

清楚楚证明了确实有个别领导一再要为王石坚翻案，而且受到了批评。显而易见熊向晖断定“无人为王石坚翻案”之说竟然全是不实之辞。

熊向晖既然要对王石坚问题发表议论，档案馆近在咫尺，普通知情者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只热衷于请教职务高的老上级而不肯眼睛向下，迈开两脚，做些老老实实的调查了解呢？

四、“辩诬”和“诬辩”

“质疑”认为拙文所说中央将王石坚定为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是“诬”了领导，“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看罢毛骨悚然。在肃杀的寒气中，忽然记起熊向晖的一段发言。也是在1998年11月23日上午的座谈会上，熊批评某位领导说：“我认为××同志对有的问题过了点，譬如王石坚的问题，1993年开国家安全会议时，住在京西宾馆，找我和陈忠经谈要为王石坚平反的意思。他有功，1947年，他在西安有三栋房子，我住在他院子里，王被捕后敌人搜查，把我存在他哪里的惟一的皮大衣、绥靖公署的信封信纸和桌上我的许多照片都搜去了。他供不供是明摆着的事……，总理的判断是对的，他供出来胡宗南也要压下的。他到台湾后的情况你并不了解呀。”（以上见熊向晖的发言录音带，现存国家安全部情史研究处）这里熊本人也批评了某领导不该为王石坚翻案，而且他的发言在我发言之前。

熊还声称要为领导“辩诬”，精神可嘉，一片对领导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但请不要忘记了中国一条古训，“君子爱人以德”，这个“德”一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坚持原则坚持党性，不然有变成无原则奉承的危险，爱之反足以害之，有失党员的清誉。正直的领导也是不会接受的。这样去“辩诬”，难免画虎不成，反成“诬辩”，结果越帮越忙、越辩越污。岂不可悲。

五、仅此而已

坚持气节教育是我党的一贯传统。江泽民主席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我们党员干部要带头发扬浩然正气，保持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高尚革命气节对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尤其重要。许多情报干部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敌人心脏，李克农等龙潭三杰深入虎穴，保卫党中央；李白上海滩英勇赴死；谢士炎等五烈士血洒雨花台；都是安全战线的千古楷模。那些无耻叛徒是反面教员。要世代教育安全情报干部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这才是安全战线在政治上的钢铁长城。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对一切有功的同志要十分尊重爱戴；对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尽管过去有的有功，也绝不能情丝缠绵、眷恋不舍，甚至去为他们翻案。否则弄得是非混淆、好坏不分，只能起到瓦解斗志、自毁长城的作用。因此在拙文中除怀念李克农的丰功伟绩外，特别强调了他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崇尚革命气节的精神。同时也希望偏离党的原则的同志有所改正。“质疑”中追查拙文“是何居心”，谨答曰：有帮助同志之忱，无阿谀讨好之用意；光明正大、坚持真理、扶正祛邪，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1999年12月